

CHAPTER 8

为什么
能实行一
党领导、
多党合作
的政党
制度



说到中国的政党制度，肯定有人要问，二战以后直到今天，全世界除极少数国家外，几乎所有国家，包括广大发展中国家，都实行两党制或多党制。为什么中国却一直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党制度，而未采纳两党制或多党制？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也是每一个对中国政治感兴趣的人士都关心的问题。问题看似很尖锐，道理说来却很简单。简言之，这是历史的选择。近代历史告诉我们：在中国，两党制、多党制运行昙花一现、乱象丛生；国民党一党专制导致众叛亲离、败走台湾；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最终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并还在不断发展完善。

昙花一现的中国多党制

1905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创立同盟会，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积极鼓吹革命思想，成为中国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在孙中山先生的号召和发动下，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的枪声在中国中部的武昌响起，革命党人发布告示“永久建立共和政体”，随后南方各省纷纷响应。1912年元旦，随着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清朝的统治在革命烈火中土崩瓦解，中国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就此结束。环顾全球，中华民国成为当时世界上少数几个推翻封建统治、不设君主立宪、直接建立民主共和制的国家之一。民主共和观念也从此逐渐深入中国人民的心中。

作为资产阶级民主



中华民国开国之日，《民立报》首页刊出的开国大总统孙中山像。

历史的
轨迹

中国共产党
为什么
能？

增订本

革命家和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的领袖，孙中山期望借鉴西方，提出中国应以“世界最完全政党之国”、“英、美先进国为模范”，⁶¹ 实行政党政治的主张。在孙中山主持下通过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按照西方的民主制度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原则，实行责任内阁制，允许结社组党。这正如国民党的青年领袖宋教仁指出的那样：“吾党主张将来宪法上仍采用责任内阁制，并主张正式政府由政党组织内阁，实行（际）担负责任。”⁶²

在《临时约法》规定的责任内阁制所开辟的政党通向权力的诱引下，无论是革命党人，还是曾经主张君主立宪以及代表封建贵族的政治势力，都希望借政党之力来获得组阁权。

一时间，“集会结社，犹如疯狂，而政党之名，如春草怒生”，⁶³ “党会既多，人人无不挂名一党籍。遇不相识者，问尊名大姓而外，往往有问及贵党者”⁶⁴。中国政治舞台上顿时出现了“组党”热潮。在这场“组党”大潮中，有人记载，形形色色的大小政党达300多个。最重要的几个政党分别是：由同盟会转变而来的国民党，由昔日资政院时代旧议员为主组成的民主党，由光复会转化而来的统一党，以及由清末预备立宪公会和湖北都督黎元洪派军人势力为主的民社联合而成的共和党。

为换取中国北方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支持革命，迫使清帝退位，1912年2月，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改由袁世凯出任。袁世凯为了加强自己的总统地位而走向独裁。他把自己的人塞进内阁，攻击新成立的国民党。而为了反对袁世凯的独裁，崇尚责任内阁制的宋教仁希望以多党竞选的办法，限制袁世凯的独裁统治。

1912年8月《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公布，确定国会由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参议院设议员274名，按地域分配议员名额。众议院设议员596名，按人口比例，从各地选民中选举产生。当时22省登记的选民有4000万以上，约占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这个比例与西方的早期选举相比也不低。在1912年

冬到1913年初春举行的国会两院选举中,形成了共和党、国民党、民主党、统一党四个大政党和一些未并入这四大党的党派和小政团竞争的局面。如此众多的选民和如此众多的政党参加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竞选,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仿佛一夜之间,西方的多党制议会民主就降临在有2000多年封建君主专制历史的东方国度。

第一届国会选举,国民党赢得国会392席,成为国会第一大党。实际负责国民党竞选运作的宋教仁曾自负地说:“自斯而后,民国政党,唯我独大。共和党虽横,其能与我争乎?”⁶⁵

宋教仁此时踌躇满志,准备组阁事宜。在国会开会之前,他亲自到长江流域各省宣传演说,为建立责任内阁,实现民主政治大造舆论。其言论风采,倾动一时。

可是宋教仁等人的政党内阁之梦很快就破灭了。没待第一届国会召开,1913年3月,在袁世凯的幕后指使下,宋教仁于游说途中被暗杀于上海火车站。

“宋案”的发生,使孙中山认清了袁世凯假共和、真独裁的面目,随后发动反袁独裁的武装革命,但遭袁世凯北洋军镇压而失败。随后,袁世凯恩威并用,对国民党部分议员进行分化瓦解,在利用国会当上大总统后,就唆使部将通电要求解散国民党。1913年11月,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次年年初,又宣布废止国会。自此,政党政治赖以生存的基础彻底瓦解,其他政党纷纷瓦解。民初的政党政治名实俱亡、寿终正寝。

民国初年的多党制昙花一现、乱象丛生,与政党的自身缺陷有直接关系。它们缺乏具有远见的政纲,民众的苦难和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远没有纳入他们的议事日程。正因如此,一般民众对于“一党一会之胜败”毫不关心。当袁世凯取消国会、遣散议员时,一般民众都成了冷眼旁观的“闲人”。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多党竞争议会内阁的失败就不可避免了。

对于1911年的革命不能建立西方式的多党制,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在他的历史巨著《美国与中国》中曾分析指出,一是没有共同目标,二是缺乏

政治体制并缺乏人民参与。最后一点且最为重要的是，中华民国向西方借鉴，通过立宪议会和内阁组织政府的想法，是同中国的政治传统脱节的。

作为历史当事人，孙中山在评论中国实行多党制这段历史的时候，曾无限感慨地说，中国照搬外国的多党制和议会制，“不但是学不好，反且学坏了”！⁶⁶

并非两党制的 国共合作

在对西方议会制度不存幻想后，1914年孙中山再次组成一个忠于他个人的秘密革命党——中华革命党，以完成未竟的革命事业。但因其组织形式及其活动方式都脱离群众，在1916年反袁世凯的斗争高涨的时候，该党并没有站在领导地位发挥作用。尽管袁世凯于1916年6月死去，但其后的中国政坛依然是袁世凯的余脉北洋军阀唱主角。“革命主义未行，革命目的未达，仅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的状况，使孙中山极度苦闷。1919年，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组成中国国民党，试图使其新生，但效果并不明显。正在此时，共产国际和1921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向孙中山伸出了援助之手。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第一个扎根于劳动人民中间、扎根于被压迫群众中间的政治组织，它强调为人民服务，通过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达到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共产党与国民党一样，都有反封建、反对军阀统治的要求。共产国际居中牵线搭桥，最后，国共两党达成第一次合作。当孙中山夫人宋庆龄

问为什么作出这个决定时，孙中山回答说：国民党好比一个就要死的人，这种合作将会加强和恢复它的血液的流动。

第一次国共合作，采取的是“党内联合”的形式，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领袖的毛泽东，当时在国民党内的最高职务是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后来成为毛泽东搭档的周恩来，出任国民党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

如孙中山所愿，国共合作确实为国民党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在共产党的帮助下，国民党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民族民主革命纲领；训练了一支党军；发展了基层组织。共产党也登上了更广阔的社会政治舞台，在斗争风浪中受到锻炼，党组织也有很大发展。而且，这并不是以削弱国民党为代价取得的。

国共合作前景一片大好之时，为共和革命奔走40年的孙中山却不幸于1925年在北京逝世，国民党后起诸领袖，无论是胡汉民、汪精卫还是蒋介石，都没有中山先生那种“天下为公”的胸襟气度，因而在与共产党合作的问题上既缺乏足够的诚意，也缺乏足够的自信。当时国民党的理论家戴季陶道出了他们的心病：“以一个大团体当中，包着一个小团体，这个小团体尽力地发挥它的组织力和排他性，旧的细胞是失了活力，新的营养反被小团体尽量地吸去。”

随着打倒军阀的国民革命取得节节胜利，军权在握的蒋介石便“开个人独裁之渐，启武人专横之端”，于1927年4月向共产党挥起了屠刀，国共第一次合作彻底破裂。在形式上完成国家统一的国民党建都南京，成为唯一的执政党，而共产党成为南京国民政府企图剿灭的非法组织。由此，国共两党进入十年内战时期。

而这时，中国的近邻日本加紧了对中国的步步侵略。在内忧外患面前，蒋介石以“攘外必先安内”为应对原则，消灭共产党成为国民党及其政府压倒一切的最优先的目标。

与此对照，处于被打压境地、最初也以推翻国民党的统治为唯一目标的共产党却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不断调整自己的视野与判断，提出符合民心的政策与纲领。

1935年，已占领中国东北的日军又制造出侵略华北的一系列事变。寇深祸亟。中日民族矛盾逐渐超越国共两党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转折，并作出了符合民族利益的正确判断。

1935年8月1日，驻共产国际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以中共中央名义草拟《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史称“八一宣言”），号召全国同胞团结起来，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组织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宣言于10月1日在巴黎《救国时报》上正式发表，不久辗转传入国内。

早年曾为无政府主义者、时为燕京大学教授的著名哲学家张东荪敏感地注意到了这个动向，率先在《自由评论》杂志发表文章，断言“八一宣言”是中国共产党政策转向的标志。

张东荪热情洋溢地欢呼：“这是何等转向，这个转向是何等光明！我们对于这样勇敢的转向又应得作何等佩服！”

中国有句古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用来比喻人事的盛衰兴替变化无常，难以预料。共产党与国民党这一对打了十年内战的冤家，于1937年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再次选择了合作。这也是中华民族“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精神的生动体现。

第二次国共合作与第一次不同，它实行的是类似后来邓小平提出的“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中国共产党承认国民政府为中国合法政府，并自认其政府为国民政府的地方政府；国民党则在事实上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存在，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政府作为直隶于行政院的“中华民国特区政府”。

蒋介石当时想“溶共”。他提出，国共合作，他是最高领袖，国共两党都

要听他的；共产党到国民党中来，成为一个共产派。负责与国民党谈判的周恩来来说：国共两党都不能取消，“只有从联合中找出路”。⁶⁷

蒋介石对抗战是有功的，但在抗战中他也念念不忘消灭共产党。他说：“此事乃我的生死问题，此目的如达不到，我死了心也不安，抗战胜利了也没有什么意义，所以我的这个意见，至死也不变的。”⁶⁸

但蒋介石的这一目的一直未达到。因为这时的中国共产党已不是十年前幼稚的党，这时的中国也不是只有国共两党活跃在政治舞台上，随着民族危亡加深，中国出现了一些新的中间党派，如沈钧儒、章乃器等组成的救国会派，以黄炎培为首的职业教育派等等。他们在大后方发起宪政运动，不断批评蒋介石的独裁政治，要求废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逐渐形成了国共两党之外的民主党派。1939年11月，国家社会党、青年党、第三党以及救国会派、职教派、乡建派等党派负责人及个别无党派人士，在重庆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该会于1942年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9月又改称“中国民主同盟”。

由于这些党派的存在，蒋介石要消灭共产党难免投鼠忌器；由于共产党的呼吁，国民党不得不改变“一党独裁”的面孔，在国共合作的前提下，设立容纳各抗日党派的“民意”机关——国民参政会。

从中国民主同盟的名称来看，与中国共产党的追求不谋而合。正是在1944年9月的国民参政会上，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改组国民党的一党政府、建立联合各党各派共同抗日的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受到了包括中国民主同盟在内的各民主党派的欢迎。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也敦促国共双方联合其他政治力量建立联合政府，并就此于同年11月在延安与毛泽东达成五项协议。

中国共产党是当时拥有军队和控制区域的党，其在陕甘宁边区等根据地推行“三三制”的政治设计，即：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在人员分配上，共产党大体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大体占三分之一，中间派占三分之一。

在共产党员超过三分之一时，多的人员就主动退出。这与国民党“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统治模式形成鲜明对照，吸引了国际友人和各民主党派方面人士。1944年6月12日，毛泽东对中外记者发表了一个谈话，把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本途径归结为“民主”。

共产党追求民主充满了诚意。1945年抗战胜利后，毛泽东亲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国民党方面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建国的方针，承诺避免内战。随后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社会各界对国内和平及民主建国充满憧憬。与此同时，在国内又形成了一股组党风潮：黄炎培、章乃器、胡厥文等组成了民主建国会，马叙伦、王绍鏊等组成了民主促进会，国共之外民主党派的阵营扩大了。

国共之间的和谈仍在继续。中国共产党方面的谈判专家周恩来曾无奈地说，从1936年到1946年的国共和谈进行了十年，他是谈判谈老了。

以后人的眼光来审视这段历史，当时的中国可能形成多党体制，但由于蒋介石“一党独裁”的理念根深蒂固，自恃军队实力雄厚，又有美国的幕后支持，最终向共产党发动了武装进攻。国共谈判也就随着1946年夏天内战枪炮声的响起画上了一个句号。

国共内战的爆发，导致了其他党派的重新组合，中国民主同盟中除了青年党、民社党等一些小党倒向国民党外，其余各党派则采取了抵制的态度，也因此而受到国民党的进一步压迫。1947年10月，中国民主同盟被国民党当局宣布为“非法”，民盟派人去南京交涉，并打算请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从中斡旋，未料司徒雷登直截了当地劝民盟“光荣解散”。以这一事件为转折，各民主党派逐渐选择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中国的政局开始重新洗牌。

众望所归的民主联合政府

国民党想通过武力来巩固其一党专政的地位，但未料想军事上接连失利，失道寡助，最终败走台湾。中国共产党则继续高举民主联合政府的大旗，凝聚人心民意，得道多助，终于建立了新中国。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中国共产党的五一劳动节口号，得到了各民主党派人士的热烈欢迎，他们先后发表了响应和拥护中国共产党号召的宣言或声明。重新在香港恢复活动的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宣传委员会代理主任沈志远发文指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不是某一党一派的道路，而是全国人民共同的道路；通过新政治协商会议以达到民主联合政府之实现，也不是一党一派的要求，而是一切为民主事业奋斗的党派、团体和各阶层人士的共同要求”。

随着战争的胜利，召开没有国民党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迅速地变成实际行动。

据不完全统计，从1948年9月至1949年3月，大批民主党派领导人从香港转移到东北或其他解放区，其中包括沈钧儒、谭平山、蔡廷锴、章伯钧、郭沫若、马叙伦、李济深、黄炎培等。1949年1月，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谭平山联名发表《对时局的意见》，公开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

经过紧张有序的准备工作，1949年6月，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参加会议的有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等共计23个单位的134人，正式成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9月17日，新政协筹备会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一致通过将“新政治协商会议”改称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等文件。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与会单位分为党派、区域、军队、团体、特邀五类。在14个党派单位中，除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外，还有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由原中国国民党民主派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所创建）、中国民主同盟（民盟）、中国民主促进会（民进）、中国致公党、中国农工民主党（第三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会议选出了由毛泽东任主席的政协全国委员会。图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会场。

8. 为什么能实行一党领导、多党合作的政党制度？

民主建国会（民建）、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台盟）等11个党派，无党派人士也作为一派位列其中。

这个由各党派、各阶层和利益集团的精英所组成的会议，虽不是经由选举产生，但较此前任何一届制宪会议都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民主色彩。

在新政协的筹备、召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不以领导者自居，不以大党自居，与各民主党派及民主人士平等协商、合作共事。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党派单位，同民革、民盟这两个成员较多的党派单位采取了相等代表名额的做法。各民主党派对此非常满意，他们的领导人说，大家一律平等，共同召集，非常周到，非常之好，称赞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风度超出各党派预料之外。在第一届政协662名代表中，各民主党派成员约占30%，工农和各界无党派人士代表约占26%。因名额有限，中国共产党各大区的党、政领导人只有一两人参加，许多高级领导人如任弼时、彭德怀、邓小平、林彪、叶剑英等均未列入代表名单。在筹备会21名委员中，中国共产党党员占7名；6名正、副主任中，中国共产党党员只占2名；筹备会下设的6个工作小组组长中，4人是非共产党员，7名副组长中只有1人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6名正副主席中，中国共产党党员只有2人，即毛泽东和周恩来。

在重大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也以平等态度与各民主党派充分协商，非常尊重他们的意见。如在国名问题上，接受了无党派知名人士张奚若的建议，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决定“十一”为国庆日，则是接受了马叙伦的建议。

新政协选举产生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和任命的政务院副总理中，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均占一半。6名副主席中就有3人是党外人士：宋庆龄是孙中山先生的夫人，李济深是20世纪40年代国统区民主人士中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张澜是民盟领导人。4名副总理中2人是党外人士：无党派民主人士郭沫若是著名的文学家、诗人，黄炎培是民建领导人。在政务院21名政务委员中，民主人士占11人；政务院下属34个机构的109个

历史的
轨迹

中国共产党
为什么
能？

增订本

正副领导职位中，民主人士占49人，其中正职占15个。这正是民主联合政府的直接外在表现。

人们还特别注意到中国共产党对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遗孀、著名的民主人士宋庆龄表达出的尊敬和诚意。1949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联名写信给留居在上海的宋庆龄，信的内容是：

庆龄先生：中国革命胜利的形势已使反动派濒临死亡的末日，沪上环境如何，至所系念。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中国人民革命历尽艰辛，中山先生遗志迄今始告实现，至祈先生命驾北来，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的事业，并对于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⁶⁹

宋庆龄作为“国母”，对蒋介石国民党是敢于批评与斗争的，她没有必要去奉承任何人，加之孙中山是在北京去世的，北京是她的伤心地，她本不想再进北京。但中国共产党的诚意感动了她，她最终同意北上。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她发言说：“我们达到今天的历史地位，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唯一拥有人民大众力量的政党。孙中山先生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胜利实现，因此得到了最可靠的保证。”⁷⁰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所产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民主联合政府，也由此奠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格局的基础。

一党领导、多党合作的丰富与发展

从历史的回溯中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是近代中国在经过多党制实验的失败、两次国共合作的分裂这样一个痛苦经历之后而选择的政党制度。它避免了多党的无序倾轧，也摆脱了一党的专制独裁；它既不同于苏联等国实行的一党制，也不同于欧美等国家实行的两党制或多党制。它是从中国实际出发、富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

从各政党所代表的群体利益关系来看，这一政党制度切合中国各阶层民众的要求。中国共产党代表全体中国人民的利益，八个民主党派（新政协召开不久，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并入民革；救国会宣布解散，其成员融入民盟）各自代表不同职业和群体的利益。如：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党员发展对象是同原中国国民党有关系的人士、同该党有历史联系和社会联系的人士、同台湾各界有联系的人士等；中国民主同盟是主要由从事文化、教育以及科学技术工作的高、中级知识分子组成的党派；九三学社，是以科学技术界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的党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其成员皆系台籍人士；中国民主促进会是以从事教育、文化、出版工作的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的党派；中国民主建国会是主要由经济界人士组成的党派；中国致公党是以归侨、侨眷中的中上层人士和其他有海外关系的代表性人士组成的党派；中国农工民主党是以医药卫生界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的党派。

不可否认，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领袖的个人威望、风范在团结各民主党派人士合作共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据民革领导人朱学范回忆：

历史的
轨迹

中国共产党
为什么
能？

增订本

“当时，李济深、何香凝、程潜、张治中等民革领导人，甚至一些中委、团委，都是‘通天’干部，他们都可以直接找周总理甚至毛主席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反映情况，交换意见。而且李维汉等（中国共产党）统战部领导同志经常去看望他们并征求意见，周总理有时也到他们家中去。”⁷¹

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坚持、发展和完善多党合作就摆上了议事日程。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他指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⁷²“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一方针的提出，鼓舞并调动了各民主党派成员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热情。遗憾的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在运行一段时期后出现了曲折，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了严重破坏。

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拨乱反正，邓小平在1979年6月召开的全国政协会议上指出，各民主党派“都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⁷³他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多党派的合作，这是我国具体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所决定的，也是我国政治制度中的一个特点和优点。”⁷⁴据此，1982年，中国共产党十二大报告提出了指导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关系的根本方针：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这个“十六字方针”，是对毛泽东所提“八字方针”（即“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发展。

之后，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不断与时俱进，增添新的内容。1989年12月，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制定了《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意见》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执政党”。各民主党派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亲

8. 为什么能实行一党领导、多党合作的政党制度？

密友党，是参政党”。⁷⁵

关于“执政党”与“参政党”的关系，原民建中央主席成思危曾有个比喻，他说，一个合唱团的内部既要有男声部也要有女声部，既要有高声部也要有低声部，既要有歌手，也要有指挥，这样才能唱出动听的歌曲，否则就会是杂音。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的关系，就好比是一个合唱团内部的关系，各民主党派是歌手，中国共产党是指挥。否则像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就会是一盘散沙。

2002年中国共产党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从构建和谐、促进科学发展的高度来认识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2007年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提出了促进“政党关系和谐”的命题，指出：“要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加强同民主党派合作共事，支持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更好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职能，选拔和推荐更多优秀党外干部担任领导职务。”⁷⁶

作为落实参政议政要求的举措，在2008年全国省级领导班子换届工作中，经过民主推荐和大会选举，一大批民主党派、工商联成员和无党派人士进入省级人大、政府、政协领导班子。当时新一届省级领导班子中，非中国



2003年3月7日，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期间接受媒体记者采访。

历史的
轨迹

中国共产党
为什么
能？

增订本

共产党人士共有205人，其中民主党派成员166人，占非中国共产党人士总数的81%。各省区市人大常委会都有非中国共产党人士担任副主任；大多数省市政协中的非中国共产党副主席都不少于50%。各省级领导班子中，新提拔的非中国共产党人士有118人，占非中国共产党人士总数的57.6%。⁷⁷

没有民主监督的政治体制，必定会导致执政能力的自我削弱。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正探索如何更好地发挥各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职能，并不断出台措施予以制度上的规定。2007年11月，中国政府发表《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第一次将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价值和功能界定为政治参与、利益表达、社会整合、民主监督和维护稳定等五个方面。这五个方面，一方面充分肯定了各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另一方面，也不乏为适应未来形势需要、推动多党合作制进一步健康发展所作的规划和设计。

随着时代的前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也在与时俱进，不断丰富发展。

